

遠紹如來，近光遺法

——試論玄奘法師的人生目標及其堅持

／呂安中

一、前言

玄奘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佛學大師、佛經翻譯家，他也是佛教宗派「法相宗」的創建者。觀其一生事蹟，皆以宗教活動為主，可分為兩個階段：前半段為求佛法，冒生命危險西行，去國近 19 年，跋涉 25,000 公里，足跡遍及西域及印度等 118 個國家；後半段則是為弘揚佛法而譯經，翻譯經書 75 部，共 1335 卷。

有關玄奘的生平概要，論者很多，此處不必贅述。這篇短文的目的，是希望透過玄奘事蹟的幾個片斷，點出他做為一個歷史人物最特立獨行的一面：早在 13 歲之時，他就已為自己立下了一生的追求目標，然後花了整整一生的時間去實踐它。在實踐的過程中，玄奘受到環境的挑戰、俗務的牽絆，甚至面臨生死的抉擇，但他從未有過改向或躊躇，這個目標不是為了一己之私，而是為了要普渡眾生。

二、遠紹如來，近光遺法

玄奘一生所堅持的目標到底是什麼？《慈恩傳》中有一段，寫玄奘 13 歲(612)在洛陽淨土寺出家的經過，當時大理寺卿鄭善果問他：「出家意何所為？」，玄奘的回答非常氣派，他說：「遠紹如來，近光遺法。」這八個字就是玄奘為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標。

出家以後，玄奘在佛學領域裡又摸索了 13 年，其間遊歷了河南、陝西、湖北、河南、四川等地，遍謁眾師，結果發現中國的佛教義學山頭林立，各地高僧對佛經見解不一，佛典系統混亂，譯文也有許多文意不通之處。用玄奘自己的說法，是「紛紜爭論，凡數百年，率土懷疑，莫有匠決」(《啓謝高昌王表》)。如要「近光遺法」，就要先解決數百年來的爭論與懷疑，玄奘認為只有回到佛教的根源處去探求才行。也就是效法法顯、智猛等前輩，到佛教的發源地——印度去留學，帶回經典，再把它們正確、忠實地翻譯出來。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說此時的玄奘：「驗之聖典，亦隱現有異，莫知所從，乃誓遊西方，以問所惑。」

於是，約 26 歲時的玄奘，在「遠紹如來，近光遺法」的大方向中，為自己的發展找到了定位：西行取經，譯而不著。

三、漫漫長路，近二旬間

有了目標，有了執行的次第後，積極主動的玄奘接著馬上就展開行動。他在長安勤學梵文，打聽去印度的路途，鍛鍊身體，為留學做準備。他心中早有定見：

日後學成，必將回國，投入翻譯大業。一如後來他在印度那爛陀寺對恩師戒賢所說，他「願以所聞，歸還翻譯」。雖然出國之時，他應當並無預知這一去竟需 19 年之久。

玄奘在「取經——翻譯」的路上，面對了不同的挑戰和困難。兩者的難題並不相同，「取經時期」是路途上沙漠惡地的行旅艱難，與西域諸國王的盛情挽留；而「譯經時期」所要面對的，則是更為複雜，人情壓力更大的政教關係。兩者相較，似乎後者又比前者困難許多。但不論是取經、譯經時期，玄奘堅持邁向目標的態度如一。先看取經時期的幾則事例：

1. 不顧國法，偷渡出境。玄奘決定西行之際，正是大唐和西域各國關係緊張之時，邊關封鎖，凡百姓出關，都要經朝廷許可。玄奘多次申請出關，都沒被批准。但是他並未氣餒，而利用朝廷因飢荒，准許人民到外地謀生的機會，混在難民當中，離開了長安。從長安一路經過秦州（甘肅天水）、涼州（甘肅武威）、瓜州（甘肅安西縣），直到國境最西邊境——玉門關外的烽火台，玄奘都是以被通緝的身分，為躲過邊關士卒的盤查，偷偷摸摸地晝伏夜行。本來同行的伙伴，如陪他出國的胡人石槃陀等，或因害怕被朝廷通緝，或因旅途艱難，都打了退堂鼓。出了玉門關後，只剩下玄奘獨自一人，騎著老馬繼續西行。

2. 流沙河裡，生死抉擇。玄奘偷出玉門關後，一人一馬，在一望無際的莫賀延磧中行進。莫賀延磧又名「流沙河」，古書形容其地「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」，大風一起，沙層就像海浪一樣席捲撲來，四方顏色千篇一律的是土黃色，地勢高處，經幾回風吹，就變成低谷，根本無法認清東西南北，只能靠駝、馬糞便和暴露在沙外的屍骨為路標。在流沙河，玄奘遭遇到西行旅程中最困難的選擇：當他失手，把水囊掉落地下，水流得一滴不剩時，玉門關在身後不遠，前方則是一片永無止境般的沙塵，他可以選擇回頭，也可以繼續前進。如果前進，那麼自己大有可能會成為別人的「路標」。在這個生死抉擇的關頭，玄奘一度決定要回頭到烽火台取水，在遲疑了一剎那後，他又決定繼續前行，不到印度，絕不回頭一步。幸運的是，就在他奄奄一息，快陷入絕境時，那匹老馬找到水源，救了玄奘一命。

3. 絕食高昌，為乎大法。高昌國位於今天新疆的吐魯番，國王麴文泰喜好佛法，希望玄奘能長留高昌，還以遣送他回國，不讓到天竺做要脅。玄奘的回答是：「玄奘來者，為乎大法，今逢為障，只可骨被王留，識神未必留也。」為了表明決心，玄奘開始絕食。四天後，麴文泰發現玄奘氣息漸弱，大感慚愧，便向玄奘行禮謝罪。兩人還結為兄弟，約定玄奘取經回國時，要經過高昌住上三年。十幾年後，玄奘原本可以從印度走海路回國，但為了履行和高昌王的約定，改走陸路。走到中途，才知道人事已非，高昌國早已被唐太宗所滅，麴文泰也已不在人世。

4. 捨棄名望，回國譯經。玄奘在印度留學的後期，羯若鞠闍國的國王戒日王在首都曲女城，籌辦了一場論辯大會。戒日王請玄奘為論主，邀請各國國王共十八位、高僧三千餘人前來辯論。結果，十八天過去，無人能辯贏玄奘。大會結束時，玄奘按照印度古禮，乘坐大象繞場遊行，接受群眾歡呼，並獲得大眾部及上座部佛學最高的榮譽——「大乘天」及「解脫天」名號。此時的玄奘，聲震五印，名

聲地位達到頂點。就在印度聲望最高之時，他反爾認為是回國的時機，謝絕了戒日王等人的挽留，決意起程回國。

四、政教雙關，應對裕如

645年2月，玄奘回到闊別近十九年的中國，總計從印度帶回佛經657部。「西行取經，譯而不著」目標，至此已完成一半。回國之後，玄奘便開始投入譯經事業，但是，最大難題是：要譯出如此龐大的經典，非得借重朝廷之力不可。因而，他與皇帝，尤其是唐太宗之間的互動關係就特別值得注意。

唐太宗是位非常務實的政治家，一切皆從統治國家的角度出發，宗教被他視為是安定社會、純厚民風的手段。因此，在處理政教關係時，唐太宗是從宗教的社會功能上著眼，儒、釋、道三教並重，有控制，也有奉揚。雖然，從《貞觀政要》中可得知，唐太宗所好者，惟在「堯舜之道、周孔之教」，個人喜好應偏向儒術，但他仍大力褒揚佛、道二教。大抵在武則天之前，唐朝各帝都維持著「三教並重，多教共存」的宗教政策。

玄奘做為一位國際知名、留學天竺歸國的佛學大師，在中國這個「政在教上」的傳統土壤上，必須與各教、他宗競爭，以爭取政府的支持。玄奘很清楚，要完成譯經大業，要與政權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。但同時，為了能全心全力譯經，又不宜涉入俗務太深。因此，我們看到譯經時期的玄奘，靠著智慧，小心謹慎地遊走在政治核心的邊緣，他不時參加朝廷的應酬與社交，接受皇帝的慰問、賞賜，同時，又謹守著自己既定的目標，不使之偏離。也因此，玄奘常會有俗務太多，「諸緣牽亂，豈有了時」的感慨。他往往為了譯經，「一入道場，非朝命不出」。

玄奘與政治圈的互動，可由他呈給皇帝的表、啓中得知一二。玄奘的文中，多有「伏蒙恩旨」、「誠深喜戴」之語。例如，改洛陽為東都時，玄奘不忘上書恭賀；為得唐太宗的「大唐三藏聖教序」，玄奘兩次上表請序，得到序文後，再上表致謝。凡此種種，頗能看出他在面對政治權力時，經常施展出一些善於應對進退的柔軟身段。也因此，有人批評玄奘是一個「很會巴結朝廷的人」，是一個沒有風骨，屈服於政治權力的出家人。但是，從一個更深層的角度來看玄奘，可以知道，他並未在上書活動中求取個人的任何好處，他只是堅定、執著地，在複雜的政教環境中，憑藉著自己在佛學界「取新補舊」的關鍵地位，使大局朝向「政治資源輔助譯經工作」的方向去發展。對他而言，為求解除當代佛義混雜的狀態，能主持千秋萬世的譯經大業，則一時政治上的彎腰，又算什麼呢！

從下面的兩個例子，可看出玄奘面對政治權力時，有所拒絕，也有所妥協：

首先，是玄奘曾兩度拒絕為官。唐太宗曾多次召見玄奘，其中有兩次，親口要求玄奘到朝廷任官。第一次是在玄奘剛回國的645年2月，與唐太宗首度見面，兩人相談甚歡。太宗希望重用這位載譽海外、博學多才的高僧，便當面勸玄奘還俗，以佐朝政。玄奘則自比為水上的船，如果離開水到陸地上，不但發揮不了作用，而且會很快地腐朽；譯經向佛，一樣可以報答國恩。第二次是在648年6月，太宗再次提出任用的邀請，這次玄奘表示：天下在皇帝的統治下，已富足康

樂，不需要一個小小的玄奘，以極力稱譽太宗的功德來拒絕任官之請。從兩度回絕仕宦來看，玄奘深知一生的追求，當在世間之外，就算是皇恩浩蕩，天大的面子，玄奘仍未鬆口，堅持立場。

其次，是玄奘爲了「應付」唐太宗，而寫出《大唐西域記》。這一點最能看出玄奘對政治權力妥協的一面。《大唐西域記》如今已是研究印度、尼泊爾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中亞各國，以及中國西北重要的歷史文獻，內容包括了七世紀時前述各地共 138 個國家的山川形勢、地理位置、歷史沿革、氣候水文等。其中僅 20 個國家，玄奘沒有親身去過。這套巨著，共 12 卷，由弟子辯機爲助手，於 646 年 7 月完成。有趣的是，寫這本書並非玄奘的本意，而是唐太宗基於政治、外交的考量，「要」玄奘寫一本有關西域的親歷記。玄奘知道，譯經非得朝廷支持才能完成，爲達到這個長時間、高難度的目標，他決定在開譯佛經的同時，由門人辯機爲助手，以一年七個月的時間完成它，題獻給唐太宗。正由於玄奘沒有親自執筆寫這本書，使得日後學界會有「作者到底是玄奘，還是辯機」的爭辯。

五、願以所聞，歸還翻譯

玄奘自回國後，一直到去世的前一個月，無時無刻不投注在譯經工作上。在朝廷大力支持之下，譯經工作大有進展。長達 19 年的時間裡，共譯出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」、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」、「瑜伽師地論」、「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」等七十五部經書，約爲他從印度帶回經卷總數的十分之一。論者認爲，玄奘所譯佛經包含印度空有兩宗，兼具中觀和唯識兩系的佛典，且翻譯忠於梵文版本，不僅意達而且辭雅，是我國翻譯史上的一大壯舉。

玄奘在翻譯上能獲得這麼大的成就，除了本身洞曉佛典，精通漢文、梵文之外，絕不能忽略的是：大唐皇帝在弘福寺、慈恩寺及玉華寺等處所設立的譯場體系。

譯場有大有小，整體而言，皆組織嚴密，有一套完整的分工制度和嚴謹的檢查和工作程序。學有專精的助譯，來自全國各地寺院，人數多時，可達千人以上。玄奘自任譯主，負責解決各種疑難問題。玄奘之下，共設有九種重要的職位：1. 証義，負責解釋梵文字義的正確性。2. 証文，聽譯主朗讀梵文，檢驗是否與原文不同。3. 書字，將梵文名詞音譯成中文。4. 筆受，正式將梵文經典譯成中文。5. 綴文，調整文句結構。6. 參譯，將譯出的中文再翻譯回梵文，檢查是否符合原意。7. 刊定，削除繁複的句子，使文字簡練。8. 潤文，負責潤色文辭。9. 梵唄，朗誦譯文，檢查音韻是否悅耳，讀起來是否順口。

玄奘譯經，在數量上是空前絕後的。據統計，從隋開皇元年（581）到唐貞元 16 年（800）的 220 年間，共譯佛經 2622 卷，玄奘一人就占了總數的一半以上。另，中國佛教「四大譯家」之中，鳩摩羅什、真諦、不空等三人譯經總卷數，方約是玄奘的一半。故中國佛經的翻譯，以玄奘爲分水嶺，之前翻譯的叫「舊經」，玄奘以後翻譯的稱爲「新經」。

六、結語

玄奘在 13 歲時就志向已定，「安危不貳其志，險夷不革其心」(唐·魏徵語)終生不悔，其間或有耽擱，但從不轉向。從上舉種種例子，實可感受玄奘那追求真理，永不妥協的精神。他「詞論典雅，風節貞峻」(唐太宗語)，有著與常人不同的人生目標，再加上不尋常的堅持與毅力，不管面對的是流沙河的死亡陷阱，還是對他恩威利誘的西域國王；不論是西行取經，還是回國譯經，在每一個交叉路口，玄奘總是選擇堅持走向自己夙寐以求的人生目標。

玄奘在 664 年去世時，唐高宗大呼「朕失國寶矣！」但玄奘又豈是「皇帝的國寶」可涵蓋的！他的志向、行爲與意志力，已然超越國家和宗教的界線，也越過時間的藩籬；每個世代，都不斷地有人記得玄奘。記得他在西域、中亞及印度留下的足跡，也記得那使他在歷史長河留名的人格典範。

